


 書摘

周著「五四運動史」述要

茶陵

新文化運動的擴展（上）

伴隨著出版業快速擴展的，是對新思想的愈加迷醉。事實上，五四事件後的那一年，就在中國新知知識分子的思路中，顯示出一個混合著懷疑主義、浪漫主義、自由主義、現實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時期。傳統思想和制度受到來自各方的批評與攻擊；新的學理、主義和現代知識中各部門的新觀念，都被引介進來並加以討論，所用的方法雖然有些膚淺，但充滿了活力與熱情。杜威於一九二〇年初從北京報導這種現象時表示：

有一位朋友在仔細研讀過大約五十篇的學生論文後說，他們的首要特徵就是問號，其次是要表達上的完全

（七）

自由，以便這個問題能够找到答案。

在一個「信仰」已爲權威教條和自滿自得所據的國度裏，這種發問的流行是一個新時代的前兆。

一九二一年的夏天，他進一步從北京報導說：

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激變以後，全國各地的學生聯合會開始辦刊物。重要的是，此時雖當反貪污腐化、賣國官吏和抵制日貨的高潮，這些話題在學生刊物中却屬次要……。他們的急務是要求教育改革、攻擊家庭制度、討論社會主義、民主觀念和烏托邦社會……。很自然地，在發酵過程中會產生許多泡沫。由於欠缺確定的經驗背景，學生們認爲所有的觀念與建議，只要它們是新的，同時涉及革除舊俗和傳統的，總是同樣地可被接受。

此時，中國人對新舊事物的態度有了重大的改變。對絕大多數的中國人而言，過去是以古舊爲評斷優良程度的標準，商品稍有價值的，總要宣傳是老牌子。比方說，藥品都習稱爲「祖傳丹方」。文學作品、繪畫和書法等風格，類多步武前賢。倫理學說、哲學、政治或經濟理論，也同樣是崇古。總之，新的應該服從舊的。甚至晚清（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）的大多數改良者和革命家，都不否定這個途徑，而只是利用它。爲了證明倡議採納西方技術、科學和憲法是正確的，他們就試着證實，包括孔子在內的中國古聖人們，在原則上早已贊成此等主張。

但是幾乎從上世紀末起，當嚴復翻譯了「天演論」，梁啟超與一些無政府主義者有過爭論以後，加上五四事件期間日增的熱烈情緒，這種觀念開始急遽地改變。隨着那時期的青年學生之舉，崇古已爲崇新所取代。這種情況帶給杜威的印象是：「世界上似乎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，學生們是如此一致地切望着現代和新的思

想，特別是有關社會和經濟方面。此外，新舊爭辯中本來利於既定秩序和地位的，却是無足輕重——的確，它有一口難言。」一位基督教的中國牧師在美國住了將近十年，於一九二一年四月返抵上海，即爲他所見到的，國人在態度和生活上的改變而深深動容：

我幾乎立刻發現自己已被一種無形的力量和氣氛所壓倒。我感覺有生命在激盪——一種過去幾年未曾發現的「新生命」。我所遇到的人，我們彼此間的交談，他們採取的態度，表示的意見，對當前各種問題所做的判斷；加上我所讀到的報紙，反映出的輿論腔調，討論的話題，全都顯示出來了這種新生命。有一天晚上我信步街頭，走進各式書店和報攤裏，共買了四十七種不同的雜誌，包括週刊、季刊和半年刊。我花了整晚的時間才將它們翻閱一遍，發現這些雜誌討論事物的切合時宜，以及表達意見的範圍寬廣，比在美國報攤上挑出的四十七種雜誌尤有甚之。從那時起我到處旅行，向各類聽衆演講，並在四、五個學校任教，我愈來愈對這種似乎日夜發展的「新生命」感到興趣。

中國青年對新思想的熱衷，立刻引起較年長的本國保守派和外國觀察家的驚懼，正如杜威所說，這些外國人接近中國時，「先帶着一種基本上是保守主義的信仰，厭惡發生改變」。有些中國教師埋怨學生的唐突犯上和心神不定。從某些方面來看，這些抱怨似乎是其來有自。我們不難想見，古老如中國者，在這樣短期內有如此大的生活態度之改變，總會造成一些驚懼的反應。

必須一談的是當時中國家庭各分子間的實際關係，特別是父親對妻子和兒女的管理上。婚姻大事是早就安排好的，而且由父母決定，無須當事人同意或知曉。而貞操爲女性單方面所必要，「節」與「孝」則被看做社會的鐵律。在某些極端的特例中，社會倫理鼓勵死了未婚夫的十多歲少女去殉節。兒子若拒絕和父母挑中的女孩結婚，就被視爲不孝和極不道德，而遭到社會輕蔑，更會喪失家產的繼承權。在這種家庭制度和倫理教條下

，中國青年知識分子的反抗是頗可理解的。它們說明了吳虞何以不信任家庭和家庭制度的一些益處，而斷言其爲專制主義的基礎。傅斯年更進一步宣稱：腐敗的中國家庭制度是「萬惡之源」。

雖然這種因襲的倫常觀念是如此明顯地不合情理，保守的士紳和軍閥政府却緊握它們不放，並且拒絕改革。許多院校仍由鮮具現代知識的人來主持，同時校中還有很多不諳科學的科學老師。

假如我們列舉一些青年知識分子所反對的，但卻遍布於中國社會的習俗與迷信，或許更能明瞭他們破除傳統偶像的熱情。他們攻擊輪迴說、有鬼論、招魂論，以及占卜、風水、算命、以符咒或巫術治病、不死的靈藥、道家的氣功等。他們也批評男人留辮子、女人纏小腳，以及叩頭、用舊曆和抽鴉片。當然，以上所舉還不算完整。這些觀念或習俗也並非爲每一個保守者所支持，但其中許多都在傳統的藉口上維持下來。

杜威的看法是，五四時期中國青年不服從和不穩定的表現，只是過渡的現象，同時證明了他們對新思想新觀念的渴求。杜威說：

心神不定固然令人遺憾，不過它是一種全面轉型期的實證，伴隨着躊躇、不安以及對新奇刺激的開放，是這個時期的必然展現。另一方面，他們對事物興趣的成熟度，遠超過同年齡的美國學生。中國的男女中學生肅耳傾聽專題演講，這些演講在美國的學校只會引起百無聊賴。我深信，地球上任何其他國家的青年都沒如此地渴求新思想新觀念。現在這種熱情已超過了延續力，好在它爲日增的尋求知識和科學方法之欲望，提供了一份額外的活力。這意謂知識的獲得，不只是在求一種技術的設計，也不是當做世俗文化的徽章，而是爲了社會的應用。

五四事件以後，出版事業的發達和思想上的除舊佈新，還不是新知識分子活動的極致，他們同時也投身一項運動，以推展社團組織和社會服務。

在五四事件以前，中國很少有像現代西方那樣組織良好的團體。存在於商人、工人、教師甚或學生裏。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年，隨着新文學和新思想運動的開展，學生們着手成立研究性質的團體，不過這只限於少數活躍的學生，社會性的組織尚未普及於民衆中。五四事件過後，「組織熱」就像「出版熱」一樣，在全國各城市傳揚起來。這些知識分子對此種組織的運行管理，不再一仍國人的舊慣，方法上多少較為民主和開放。

一些在示威和罷課期間成立的學生團體，終究變成臨時性的，在六到十二個月內就解散了。但是成立於個別學校的，或以一省一市為根基的學生聯合會，就像許多同時產生的社會團體一樣繼續存在。總部設在上海的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，成為這些新組織中最活躍及具影響力者。其他在事件後繼續存在的重要學生組織，有創立於一九〇五年而重組於一九一九年的環球中國學生會，以及留日學生救國團、歐美學生會；後者是五四事件後，由留美學生聯合會改組和擴充而成的。

除了這些自治團體之外，學生們還成立了其他知識性的組織，以利研究、討論、民衆教育和社會服務，或其他社會、文化或政治的目標。它們包括家庭建設討論會、中國哲學會、新教育共進社、社會主義研究會、羅素學會、新學講演會（或稱講學社）、實際教育調查會、通俗教育協會等。此外，共學會曾圖吸引大量的學生共同學習，於五四事件後的時期，翻譯並出版了很多西方現實主義的戲劇和小說，特別是法國、俄國和德國的作品，以及後來的共產主義文學。年紀較大的知識分子也以相當的熱情，參加了各種活動。尚志學會是由卸任官員和作家所創設，包括了梁啟超、范源濂、林長民和張東蓀諸氏，也盡力介紹過西方文化。其領導成員們常在財務或其他方面，支持西方思想家來華講學，也出版過許多西方哲學著作的中譯本。

新知識分子同時也和其他的社會團體合作。這主要是經由志向遠大的全國各界聯合會而行事，該會於五四事件後創立，總部設在上海，旨在協助各團體的行動一致，並尋求彼等參與國事時，能獲得內外支持的可能性。該會的組成單位有中華民國學生會、女界愛國同志會、全國基督教救國會、中華總商會、全國新聞記者協會，以及名流、勞工和其他社會與宗教團體的代表。此類聯合性的組織，從上海蔓延到天津、北京等大城市。

除了學生的聯合會之外，這些新團體中最活躍的是許多小社團，它們是由青年知識分子在校內或校外成立的。舉例來說，「少年中國學會」發起於一九一八年，但要待五四事件後才轉為活躍。應當感謝事件的刺激，該學會經過一年的準備，一九一九年七月一日正式成立於北京。當時它有七十四名會員，其中大部分是學生、教育工作者、新聞從業人員和作家，他們處身於國內主要城市及國外，後來有不少變成現代中國的政治、社會或教育領袖。在成立大會上，大家接受李大劉及其他會員的建議，為求配合當時的思潮，修改了前此於發起階段提出的四項目標，並重新肯定了學會的如下宗旨：「本科學的精神，為社會的活動，以創造少年中國。」此外，還採用了四句口號來引導所有會員的活動，即「奮鬥、實踐、堅忍、儉樸」。學會的組織雖然不算嚴密，但其會員經常和總部保持連繫，表達彼此對重大社會及文化問題的不同觀點，並且報告他們對國內外經濟和社會局勢的印象。他們也舉行過許多次討論會，主題各有不同。除了「少年中國」和「少年世界」這兩種會刊外，學會另在一些城市出版了小型雜誌和不少的小冊子。

此類由學生和青年組成的較小社團，多至不勝枚舉。實際上，支持或創辦數以百計新刊物的，大多是一些小社團，如曙光社、共學會、社會實進會、青年進步社、真社等。這些組織的實質互異，分別屬於自由派、社會主義者或其他的政治色彩，其中有許多日後的政治領袖，或左或右，就是從這裏開始他們的有關生涯。全屬政治性的組織同樣吸引着青年。有些青年加入國民黨，其餘加入了當時難以計數的政治小團體。從一九一九年秋天起，許多政治或半政治的組織，是由學生們建立或強化的，這些學生中有人日後變成中國共產黨的領袖，雖然在一九二〇年以前，他們只是傾向理想主義的社會主義或自由主義，而非採取共產主義當做他們的信條。

五四事件後不久有一種趨勢，就是不同的團體結合在一起，以推行它們共同的目標。例如，改造聯合會是由少年中國學會、人道社、曙光社、北京覺悟社和青年互助團組成的。這個聯合會公布過一篇宣言和一種會章，雖然它維持不久。

幾乎所有新組織都表現出理想主義的特德，這可舉五四事件後新知識分子倡導的一些運動為例來說明。日本有一個烏托邦式的社會運動叫「新村」，由武者小路實篤所推展，吸引了一些中國教授和學生。新村的理論和組織，透過周作人及其兄魯迅和其他作家的介紹，一九一九年在「新青年」及「新潮」雜誌同時發佈開來。這個運動建基於克魯泡特金、托爾斯泰以及某些理想社會主義者所主張的互助和人道主義哲學上。村民放棄他們所有的私產，目的在實現「各盡所能，各取所需」的理想。「新青年」發表了武者小路的一封信「與支那未知的友人」，和一首詩「寄一個支那的兄弟」，隨着刊出中國知識界領袖蔡元培、陳獨秀和周氏兄弟的熱情反應。由此及其他刊物顯示出，武者小路的理想社會主義和人道主義，帶給五四事件後中國新知識分子深刻的印象。

知識分子對新社會的熱情，同時展現在他們自己創造一種新生活的嘗試上。一九一九年多，包括王光祈、羅家倫和徐彥之在內的一些青年知識分子，獲得蔡元培、陳獨秀、魯迅、李大釗和周作人的支持，並在法國工讀組織和前述新村的影響下，開始在北京、天津、上海等大城市組織工讀互助團。每位團員不僅被期望着要讀書，每天至少還與工作四小時。收入屬於全團所有，而每人的生活和其他基本開支，如學費、醫藥、房租、衣服、書本等由該團供應。工作包括開設印刷所、餐館、洗衣店，以及從事手工業和小販叫賣。雖然這個計畫沒有大幅度地實現，而且最後終於歸失敗，但它至少暫將許多新知識分子的理想付諸實行，而且這種實際經驗影響到他們日後對社會問題的想法。這個運動支持者的觀點頗為廣泛，它的失敗也使一些新知識分子上了一課，他們終於體認到，在這個既定的經濟和社會中，沒有城市工人或資本家合作的話，他們不可能創造一個烏托邦。

比較成功和聲名遠揚的，是這些組織在全國推行的大眾教育計畫，包括了下述各項：

一九一九年以後，演講在中國蔚為時尚。幾位西方著名的思想家受邀來華訪問，目的就是發表演講，他都受到熱情的接待。杜威是最早來訪者之一，在一個教育協會的邀請下，他在中國勾留了兩年又兩個月，旅行過

奉天、直隸、山西、山東、江蘇、湖北、湖南、浙江、福建、廣東等十一個省份。他發表了許多次學術性或大眾化的演說，特別是在北京、南京和山西省。他在北大的五次重要演講，多由胡適擔任口頭翻譯，講題分別是：(1)「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」（首次以實驗主義的觀點來探究）；(2)「教育哲學」；(3)「思想之派別」；(4)「現代的三個哲學家」（柏格森、羅素、詹姆士）；(5)「倫理演講」。這些講稿都出現在報刊上，後來又輯印成書，造成兩年內每回萬冊的十四次印刷記錄。他其餘的演講也吸引了師生和其他知識分子，並受到當地和全國性報紙的詳盡報導。實際上，這是首次一位西方哲學家在現代中國做過這樣多的演說。他的哲學、邏輯和教育專書也被譯成中文，而且銷行甚廣。

一九二〇年九月五日，梁啟超創設了講學會，辦理中外著名學者的大眾化演講。該會曾建議政府，每年應提供兩萬圓的經費以邀著名學者來華演說。此時杜威還在中國，梁啟超等人邀請羅素於訪問蘇聯後來訪。他於十月十二日抵華，停留了將近一年之久，在北京發表過多次大眾化的演講，也做過五次學術性的演講：(1)「數理邏輯」；(2)「物之分析」；(3)「心之分析」；(4)「哲學問題」；(5)「社會構造論」。在羅素訪華前後，他有關社會、政治和哲學領域的著作被譯成了中文，通行於中國的改革者和進步人士中。羅素學會也立即組成，「羅素月刊」又於一九二一年一月創立。羅素的哲學和人品對中國知識分子，尤其是活躍青年的影響，在五四後期較之其他的當代西方思想家為深。

除了杜威與羅素外，美國教育家孟祿（Paul Monroe）於一九二一年九月五日訪華，德國哲學家杜里舒（Hans Driesch）於一九二二年到中國，印度詩哲泰戈爾也於一九二三年應邀來訪。中國新知識分子還計畫邀請柏格森（Bergson）和倭鏗（Eucken），但是未獲實現。

中國學生同時在不識字的民衆間，推行了一個廣泛的通俗演說運動。他們在其中傳播科學知識、愛國主義、新倫理觀，以及許多新的社會和政治思想。主辦演講的一個團體是平民教育講演團，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，它由北大學生廖書倉、鄧中夏、羅家倫、康白情、易克嶷、周炳琳、許德珩、張國燾、王光祈等人創之。

該團的工作在五卅事件後大為加強，團員在城市和鄉下做過無數次的講演，並分發印就的講詞和通俗雜誌給民衆。直到一九二三年止，該團有時是不顧警察的干涉而推行自己的工作。類似的組織也存在於北京高等師範學校。

五四事件以後，許多學校爲工人和貧民子弟開辦了免費的夜校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，中國有些學校和大學，爲它們的工友設立過夜校。北大於一九一七年開始成立「校役夜班」，一九二〇年一月十八日，該校學生聯合會開辦了「平民夜校」。這些措施打破了中國高等教育的傳統，即過去對平民入學——尤其是入大學的制止。在較早的時代，學校門口時常設置這樣的牌告：「學堂重地，閒人免入。」及至一九一九年底，北大理科所設夜校已有超過五百名的學生，年齡在七歲到三十歲之間。其他學校也開辦了類似的夜校。其他還有一些免費的學校，爲學生和商人所合辦，而由後者提供財力支持。據說，五四事件後學生聯合會設立的大衆免費學校「遍及全國」。一位美國記者於一九一九年八月自中國報導說：「學生們已經在永久性的基礎上組織起來，要教育全國的民衆和貧童。只上海一地就有十六所免費的學校，爲那些無力交學費的兒童而設，類似之舉也在全國各城展開。學生們還和鄉村的農民打成一片，以推行一項促進全國一體的運動。」一九二〇年，晏陽初根據他在法國教華工的經驗，展開了著名的「平民教育運動」。因受當時學生們大衆教育的熱情之助，此後十年內這項運動得以大爲擴充。學生和知識分子們所推行的社會服務，同時包括了壁報、公共圖書館，以及大衆衛生的改善工作等。

從上述事件的發展過程中，我們可以明白地看出它們的相互關係。它們的共同目的，可用「新文化運動」一詞來辨認，這個名詞也逐漸用以涵蓋所有此類的發展。創造一種新文化或新文明的想法，只是在早些年前展開的，陳獨秀在一九一五年創辦「新青年」以後，開始注意到這個概念。在該誌的創刊號上，他寫了一篇「法蘭西人與近代文明」，並翻譯了薛紐伯（Charles Seignobos）的「現代文明史」第三章。一九一六年初他又說，人類生活的特質是文明的創造，而二十世紀的人應爲二十世紀創造一種文明，不該再追隨十九世紀的舊

章。一九一九年一月發行的「新潮」創刊號上，學生們也宣稱，該誌的首要任務是引導中國自適於現世的文明。然而，這些雄念和有關的活動，一直要等到五四事件之後，才被新知識分子們當成一種新文化運動，來做有系統的提倡。

「新文化運動」這個名稱，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後的半年內得以流行。那年十二月，「新潮」編者在答覆一位讀者時指出，他們的運動就是「文化運動」。到了一九二〇年初，這個運動變成非常普及。事實上，從一九一八年春起，許多進步黨的報紙已開始支持這個新思想運動。國民黨員也以個別的身分，成為它的熱烈支持者。孫中山先生在一九二〇年一月正式表示贊同，他概括了這些所有的新思潮，視為一種新文化運動，並要求全體同志予以支持。他致書海外同志時指出：

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，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，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。於是蓬蓬勃勃，發抒言論。國內各界輿論，一致同唱。各種新出版物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，紛紛應時而出，揚葩吐豔，各極其致，社會遂蒙絕大之影響。雖以頑劣之偽政府，猶且不敢攔其鋒。此種新文化運動，在我國今日，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。推原其始，不過由於出版界之一二覺悟者從事提倡，遂致輿論大放異彩，學潮瀾漫全國，人皆激發天良，誓死為愛國之運動。倘能繼長其高，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久遠者，可無疑也。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，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，兵法攻心，語曰革心，皆此之故。故此種新文化運動，實為最有價值之事。

孫中山先生在這封信裏，承認並指出了五四運動對中國社會的重大影響，以及「新青年」、「新潮」和其他雜誌在運動中的領導地位，也提到學生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發展的密切關係。實際上，從五四事件那時起，許多國民黨領袖和其他進步的知識分子，就已加入或積極支持這個新文化運動。

依照當時大多數新知識分子的使用情況來看，「新文化運動」一詞含義甚廣，大於後來被承認的範圍。一

九二〇年春，陳獨秀在討論新文化運動時，將「文化」的意義限於有關科學、宗教、道德、文學、音樂和藝術之類，而不以它的社會學涵意來包括實際政治、社會和經濟的行動。一九二一年初，他更進一步辯稱，文化和社會運動是兩樁不同的事，彼此不能互相概括。很明顯的，五四事件後新知識分子的活動，確已超越了此種狹義的文化運動之範圍。不過在事件後的一年中，知識分子活動的重點似乎還在狹義的文化領域內，後來才放在實際的社會或政治行動上。結果，帶有這種涵意「新文化的運動」一詞，在當時廣為國人所接受。

五四事件後新文化運動的深遠發展，給中國帶來了一個新的外觀和大的希望。杜威在對新文化運動做了很長的分析以後，得到的結論是：

我們可以堅稱，新文化運動即使是多麼生硬和不穩定，但却為中國的未來提供了一個紮實的希望。它固然無法取代較好的交通工具——鐵路和公路——沒有了這些，中國將不能統一和富強。不過中國人也需要有一致的心念，這就非新文化運動不為功。此外，這種心念是回首於前塵，還是同感於當世的現代思想，也會造成全然不同的結果。

中國的青年知識分子對此更懷抱樂觀，他們把新文化的改革活動視同黑暗中的一線光芒，足以照亮一條救國的希望大道。它對年輕的中國人極具吸引力，許多有才智有抱負的留學生都決定回國加入。事實上，在五四事件後的那段時期內，大多數有志獻身的中國青年都被愛國的情懷所支配了。